

中原地区早期地藏造像之 样式、渊源和信仰

陈 佩 姝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地藏信仰在中国流行的时间已一千多年,中原地区早期的地藏造像具有相当的特色,其样式可大致区分为菩萨形、佛装形及沙门形 3 种。而这些地藏像遗存的题记,反映出时人造像有求众生俱得出家修道、愿众生俱登正觉、成佛果,为亡者或在世亲眷造像,为现世利益造像等多种目的。

关键词 中原地区;早期地藏造像;地藏信仰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0)02—0138—04

地藏信仰在中国流行的时间已一千多年,因其具有庶民信仰之特质,而博得广大群众的信赖,其影响几乎可与观音信仰媲美。虽然中国地藏信仰滥觞于北凉时期,然至隋唐之际,随着地藏经典的传译,崇尚地藏菩萨的风气方日益兴盛,僧尼和信众争相雕刻或请绘地藏尊像,置于石窟、寺院或私人佛堂,以便礼拜、供养之用。从现存雕塑与绘画实物来看,地藏菩萨造像最为流行的时代是唐宋时代,而本文题目所说的“早期”是指从初唐贞观末年到武则天时期。从区域看,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数量最多,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等,亦有一定程度的遗存。这些早期的地藏造像可分为菩萨形、佛装形及沙门形 3 种,本文即试图通过对这些地藏造像的分析,来讨论地藏菩萨形式多样化之原因以及初期的地藏信仰特色。

一、地藏造像的表现形式

从现存石窟看,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早有铭文纪年的地藏造像,为河北省隆尧县宣务山高宗龙朔年间(661~663

年)比丘尼真□造像^{[1](P56)}。然而在早期地藏造像最为集中的龙门石窟,学者常青则指出了宾阳南洞李□静造的地藏像,虽未有铭文纪年,但可能早至唐贞观末年或永徽年间(650~655 年)^{[2](P29~30)}。大致而言,中原地区早期的地藏造像形式最主要的特色表现在其头部,即束发的菩萨形、顶肉髻的佛装形、圆顶光头的沙门形。以下分别叙述这三种地藏造像的特征与风格:

1. 菩萨形地藏像。该类造像主要存于龙门石窟,是今日所知最早的地藏造像样式。其基本特征为头束发髻,帔帛绕肩,身饰璎珞,下着裙,其风格样式与这一时期的其他菩萨装扮相似。这些地藏像大多采取左、右舒相坐,如宾阳南洞牛懿德所造的地藏菩萨像,左手抚左膝,右手弯曲上扬,坐姿呈左舒相坐,即右足弯曲于座上,左足下舒踏覆莲圆足踏。除舒相坐式外,尚有一些立像菩萨,例如宾阳南洞李□静造地藏像,该像身躯直立,帔帛在腹下交叉,左手下提一净瓶,右手弯曲上扬似作拈花状。另外,普泰洞外上元二年(675 年)造像、惠简洞清信女贾造像、敬善寺李庆造像、蔡大娘洞比丘尼九娘等造像,均为立式,袒裸上身,下

收稿日期 2009—11—19

作者简介 陈佩姝(1976~),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

着长裙,饰帔帛和项圈^{[2](P29)}。这些立式地藏像多在一铺或一组造像之中。这种情况不只见于龙门石窟,在南响堂山也存在^{[3](P57)}。因此,若无题记说明这类立像菩萨的身份为地藏菩萨,很难从造像的风格样式确定之。

2. 佛装形地藏像。这是近年来才发现的地藏造像样式,主要出现于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大多凿造于武则天时期,主要特色在服装上,有袒右式袈裟、双领下垂式大衣、通肩式大衣等,与当时佛像的服装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时,这些地藏像的头部虽然大多已残损,然从遗迹中仍可发现造像头顶有突起之状,犹如佛顶之肉髻,因此有些学者称这类的地藏造像为佛装形地藏像。例如,千佛洞 Q163 号龕的地藏像,头部偏大,顶上显然可看出有突起之肉髻;同样地,千佛洞 Q59、Q118、Q130、Q131 号等龕中的地藏头顶似都有肉髻^[4]。当然大佛寺石窟中的地藏菩萨是否全为佛形像并不能完全肯定,因为佛的袈裟与僧装是很相似的,而某些造像的头部残留较少,很难看出是否存有肉髻,因此亦不排除这些地藏像中有沙门形地藏的可能性。

3. 沙门形地藏像。沙门形地藏像的最主要特征即是圆顶光头,身着袈裟,有如一铺造像当中的弟子像。这种形式的地藏造像分布范围较前两种地藏形像要广。南响堂山的地藏主要是此种样式,其中亦不乏有确切纪年者,如第 3 号窟有证圣元年(695 年)□娘男元琰造地藏像,此龕造像记并明确题为“敬造沙门地藏菩萨”^{[5](P11)}。另外,第 1 号窟中心柱宝坛左端有长安年间(701~704 年)的观音、地藏组合像,第 4 号窟神龙元年(705 年)亦为二尊像的组合,两龕的地藏像特征皆为圆顶光头,着双领下垂袈裟,左舒相坐于须弥座上,舒足踩一足踏,右手弯曲上扬,左手抚膝^{[6](P55,56)}。此外,彬县大佛寺石窟亦有沙门形地藏像,如千佛洞 Q123 号龕为长寿二年(693 年)比丘神智造像和长寿三年(694 年)李承基造像的组合,该像呈舒相坐,一手仰掌置于腹前,一手弯曲外扬执一物,头部虽残毁,然就形像及名称来看,应为沙门形地藏像^{[5](P150)}。若以这些沙门形地藏像的造型对比龙门石窟王元轨洞及八作司洞内的三尊舒相坐僧形像,可知这些造像亦是沙门形地藏像^{[2](P30,31)}。龙门石窟这三尊像雕造时间约高宗时期,比南响堂山石窟和大佛寺石窟的沙门形地藏像要更早一些。

二、地藏造像多样式之原因探讨

上述地藏造像与后来我们所熟悉的表现为圆顶光头

的地藏菩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为何其呈现出 3 种不同形态呢?笔者试从两点来论述其中的可能原因:

1. 不同经典的影响。地藏经典传译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的一部当属北凉译经《大方广十轮经》,经中说言:“是地藏菩萨作沙门像。”^{[7](P681C)}玄奘大师于永徽二年(651 年)重译此经,定名为《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经文亦言:“有菩萨摩訶萨名曰地藏,……并诸眷属作声闻像将来至此”^{[8](P721C)},又言:“地藏真大士,具杜多功德,现声闻色相,……勇猛名地藏,现出家威仪。”^{[8](P727b)}这都是沙门形地藏造像的直接根据。《十轮经》中虽明确说地藏菩萨现沙门像,然经文中亦隐约透露地藏菩萨有其他形像的显现,如:“(地藏菩萨)为欲成熟诸有情故,于十方界,或时现作大梵王身,……或作佛身,或作菩萨身,或作独觉身,或作声闻身……或作剌魔王身,……现作如是等无量无数异类之身。”^{[8](P725b~726a)}可知地藏菩萨能化现种种身份度化众生,其中亦包括佛身及菩萨身。这说明了初期的三种地藏形像与《十轮经》有较密切的关系。

关于地藏菩萨现佛形像的原因,又可从隋译本《占察善恶业报经》看出,文中提及地藏菩萨早已达到佛的智能,但依本誓愿故,而权现菩萨身份,如经言:“佛告坚净信,……此善男子(地藏菩萨)发心已来,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久已能度萨婆若海,功德满足,但依本愿自在力故,权巧现化影应十方。”^{[9](P902a)}经中的“萨婆若”即指诸佛究竟圆满果位之智也。而玄奘的新译本《十轮经》亦言:“如是大士(地藏菩萨),成就无量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已能安住首楞伽摩胜三摩地,善能悟入如来境界。”^{[7](P723b)}此亦证明地藏菩萨早已证得佛果妙德。此外,武周时期的译经《如来不思议经》,虽非与地藏相关的经典,然经中有言:“时有十佛刹微尘等他方诸佛,为欲庄严毗卢遮那道场众故,示菩萨形来在会坐,其名曰观自在菩萨、……地藏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訶萨,而为上首。”^{[10](P909a)}此段经文说明地藏本为他方诸佛,但现菩萨身份来庄严毗卢遮那道场,这更是将地藏菩萨的身份直接引至佛身。或许正因为不同经典相继译出,使地藏身份有多重转换,致使地藏造像在初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2. 传统造像对地藏像形制的影响。该因素特别明显地作用于菩萨形地藏像。从民间信仰而言,地藏信仰传入中国的时间较其他菩萨信仰如观音、文殊等信仰要晚些。隋唐时期,观音信仰早已十分兴盛,民众对观音造像可说是非常熟悉,因而对刚兴起的地藏造像,在未完全明白其图

像志之前,有可能参考其他菩萨的形式来雕造,其中观音造像便是主要参考题材之一。如前述龙门石窟中李□静所造的地藏像,在外形上与初唐的观音像十分相似,其左手提一净瓶,亦是观音造像中常见的法物。此外,前述普泰洞外上元二年(675年)等造像亦与初唐的菩萨无异。从龙门石窟的地藏像多在中小型龕来看,可知信奉者多属于社会中下层,其时他们可能对佛教造像未有深入的了解,基于造像功德的诱发,即依既有的菩萨形像而创造出早期的菩萨形地藏像。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题记明确造像是地藏菩萨像,其身份恐难以确定的原因。

三、早期地藏造像反映的民间信仰

中原地区的地藏造像保存不少的题记,这对研究地藏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题记中所记述的发愿文反应了造像人的思想认识和主观心愿,它道出了造像者的渴望与追求,表达出地藏信仰的部分内涵。从其内容看,除有些仅记述某某人造地藏像外,其他对造像动机有所反映的祈愿可归纳成以下方面:

1. 为求众生俱得出家修道。这类题记都出现在龙门石窟中,不见于他处,如总章二年(669年)法藏尚等造像、永隆元年(680年)、二年(681年)处贞造像等,其时间皆在高宗晚期。这种有关出家修道的内容除上述地藏造像记外,在《龙门石窟的研究·龙门石刻录文》中,仅见于处贞所造五百尊弥勒像记中,除此未有。另外,侯旭东在《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一书中,对收集到的五六世纪北方1600多条造像记进行分析,这种以“出家修道”为祈愿内容的,亦不见有之。因此,庄明兴对此一现象下了定论,即“地藏造像中出现这样的题记,应能代表其特有的信仰特质之一”^{[11](P18)}。

此处言地藏特有的信仰即指《十轮经》中提及的地藏菩萨现出家沙门形象,以护持三宝,不废声闻、缘觉二乘的经义有关。虽然上述题记中的地藏造像都是以菩萨装形式出现,然受当时新译本《十轮经》的影响,经中谈及地藏菩萨现出家像以化导众生,或许就是造像者祈愿出家、修成无上道的一个依托。亦或僧尼们为令众生不舍道心,不失正法,俱得出家而祈愿。从新译本的序品中清楚地表达出地藏菩萨正是末法恶世的救世者:

十轮经者,则此土末法之教也。何以明之?佛以末法恶时,去圣浸远,败根比之坏器,空见借喻生盲。沈醉五欲,类

石田之不苗,放肆十恶,似臭身之垢秽。故此经能濯臭身,开盲目,陶坏器,沃石田。是以菩萨(地藏菩萨)示声闻之形,象王敬出家之服,以此幢相,化彼无惭。显二事之护持,成三乘之道果。故经曰:为令此三宝种姓威德炽盛久住世故。又曰:摧灭一切诸众生类犹如金刚坚固烦恼。^{[8](P777a-b)}

文中不难看出《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体现出末法时代的忧患意识,既对僧团内部谤正法、贪名利、愚痴无明加以批判,又强调维护僧众尊严,以使正法不灭,同时对五浊恶世众生于正信难发而给予增信。所以,地藏菩萨现沙门形的真正用意乃是护法、护教、护僧团,不但令信众睹其尊容而生恭敬,亦令出家僧众知现比丘身有无量功德,当心存惭愧,护诸戒行。

2. 愿众生俱登正觉、成佛果。这样的题记在龙门、南响堂山、彬县大佛寺等石窟中都有出现,以有纪年的论之,其年代主要集中在武周时期。如长寿二年(693年)比丘神智造像、证圣元年(695年)□娘男元琰造像、圣历二年(699年)王大贞造像、神龙元年(705年)荆义□造像等。除了以地藏为主的造像记外,在龙门或南响堂山石窟的其他题记中,不难发现这种“俱登正觉”、“俱成佛果”的发愿文,亦是其他造像题材中常见的内容^[12~13]。

成佛、登正觉是佛教修证中的最高境界,成为佛教徒所追求的目标^{[14](P204~211)},在6世纪初至70年代北方民众的造像活动中,这类题记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祈愿内容。入唐以后至8世纪初之前,以观音、弥勒、阿弥陀等传统佛教造像为题材的题记,对成佛、登正觉的追求,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地藏菩萨作为当时造像新题材的出现而有这类祈愿内容,说明“登正觉、成佛果”既是佛教信仰终极目标的体现,同时又显示出传统造像思想的强大影响力。此外,这类内容所反映的亦是一种功德回向的大乘佛教精神,以造像功德回向人人成佛、俱登正觉,这种宏大心愿正是中国大乘佛教的特色之一,因而在题材上便不限定为某一尊造像所独具。

3. 为亡者或在世亲眷造像。关心死去亲人来生的命运,而为亡亲造像追福者,自南北朝起已有,可说是造像中的主要动机。在有纪年的地藏像记中,如垂拱三年(687年)路敬潜妻造像、长寿二年(693年)任智满造像、长安年间(701~704年)的造像等,就属这类。

佛教传入中土后,渐渐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死观,尤其是轮回观念的输入,使得信众相信死后的归宿取决于亡者生前的行为。这种新生死观的确立促使信徒广修佛事

以换取来生的解脱,而中国人注重家庭伦理,因此这些造像记中的祈愿对象,多为造像者的家庭成员。上述地藏造像记中如路敬潜妻指出其造像目的:“愿以福因,上资冥路”此即明白指出以造像功德来为亡者追福。其他为亡亲造像的,其作用也应该与之相似。

4. 为现世利益造像。此类情况包括祈求平安、病患早愈、消除口舌争端等等,另外还有未纪年但可能是早期地藏造像的有比丘尼九娘造像、赵行整造像、裴罗汉造像、□弘福妻造像、比丘□□造像等。这6例中,仅1则有纪年,其他均无纪年。值得注意的是,这6条造像记中,就有3条是以地藏与观音的组合形式出现,这种高比例的现象反映二尊菩萨在救济功能上的相似。如上经文所述,地藏菩萨在拯救众生时可以化现多种形像,观音菩萨亦有变化种种形像的能力,如《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谈及观音菩萨在度众生时,是应众生当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也可从一侧面说明,早期地藏造像有诸多因素是发自于观音菩萨给予的灵感。

此外,在中国佛教的造像活动中,对现世利益的追求一直是重要目标,因此当这类愿望被实现时,民众对这尊佛菩萨的信念就会更加巩固,对佛教也能更虔诚地奉信,因而地藏造像记中出现这类的祈愿内容也是理所当然。

5. 其他。彬县大佛寺的地藏造像题记共6条,除长寿二年(693年)比丘神智造像是为出家修道外,其他内容均不同于前4类,如长寿三年(694年)李承基造像、证圣元年(695年)元思睿造像,其内容表现造像者希求得禅定、证果位的意愿。题记中的“三明”、“四果”、“四禅”等字眼都是指证果的层次。这些修证果位与禅定的境界是分不开的。根据《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地藏名德既然以“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来认定,显然这寓以甚深禅定之义。此经亦述及地藏菩萨为欲成熟诸有情,而善入众多禅定境界,如“已能安住首楞伽摩胜三摩地,……已能安住师子奋迅幢三摩地”^{[8](P723b)}。由此可知,地藏菩萨能安住种种“三摩地”的禅定境界,这和造像者希求得禅定解脱的造像动机应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另外,证圣元年(695年)元海、元会造像、证圣元年(695年)云景嘉造像题记,所表达的是希望藉此造像功德令今生或来世获福得利,这种情况相似于龙门石窟上元二年(675年)弟子等造像:“阿弥陀尊像一区,□救苦观世音菩萨一区,□地藏菩萨一区,今并成就,以此福□,普遍一

切苍生,同斯福果。”^{[2](P28)}中国佛教徒对于营置福田一事相当重视,而佛教造像之所以如此兴盛,在于他们相信雕造佛菩萨像是一件大功德,可获得种种福报,充当善业之积粮,以求他日之福果。

而圣历元年(698年)高叔夏造像的造像题记内容,表达出强烈的末法思想,因恐地藏图像不存,故而雕石像以为传世。这种因末法思想而带动的造像活动早在北凉石窟就已存在,如《法苑珠林》卷十三记载:“凉州石窟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久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盼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斲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15](P387a)}其他如云冈、响堂山与安阳石窟、邺城与山东的刻经等,这些在北朝晚期的摩崖刻经与窟像之铭记中,都表现出强烈的末法意识。地藏菩萨作为末法时期的救世主,受此观念影响而造地藏像,既使护教令造像得以久存,亦是一种崇敬和认可地藏菩萨之功德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张稼农.隆尧县宣务山文物古迹介绍[J].文物参考资料,1957,(12).
- [2]常青.龙门石窟地藏菩萨及其有关问题[J].中原文物,1993.
- [3]潘亮文.中国地藏菩萨像初探[M].台南:台南艺术学院,1999.
- [4]张总.地藏信仰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 [5]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J].文物,1992(5).
- [6]常青.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8.
- [7]大方广十轮经(卷一)[A].大正藏(册十三)[C].
- [8][唐]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A].大正藏(册十三)[C].
- [9][隋]菩提灯译.占察善恶业报经[A].大正藏(册十七)[C].
- [10][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A].大正藏(册十)[C].
- [11]庄明兴.中国中古的地藏信仰[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
- [12]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の研究·龙门石刻录录文[M].京都:溇右宝刊会,1941.
- [13]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刻录录文[M].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
- [14]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5][唐]道世撰集.法苑珠林[A].大正藏(册五二)[C].

[责任编辑 杜雪飞]